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史海钩沉】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严家祺
【谈史论今】	毛泽东之“梦”复活的氛围	丁学良
【往事非烟】	父母家的抄家	庸 猫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史海钩沉】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为“文革”爆发五十年而作

• 严家祺 •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一九七七年，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文革前，科学院有许多学部，除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外，还有数理化学部、地学部、生物学部等。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有许多研究所，如哲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法学所、民族所、语言所、学术资料室、政治部、《新建设》杂志社等，全学部有一千七百人。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以，学部也设立了政治部。

◇ 早于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一天，汪东兴代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文革还只是在报刊上进行大批判，批《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批三家村，全国上下，还没有一个单位贴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谈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通常会想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实际上，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学部贴出的。一九六六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郭沫若，学部党委书记是关山复，政治部主任是杨述。

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两天，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在学部一号楼的走廊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在康生的授意下，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是

“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接着，学部大楼的走廊内外的墙上、学部大院许多地方贴出了数十、数百张批判杨述、关山复等学部党委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学部大楼墙内墙外已布满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是从全国报刊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学部的文革就是从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开始的。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杨述出身于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他影响下也都参加了革命。抗战初期，杨述的母亲“毁家纾难”，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开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刊。出版社楼上是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被捕后被国民党活埋了。文革开始时，杨述是学部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号楼后面的小红楼里。

杨述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就是他的“罪证”。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学部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包括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大大小小会上受到多次批斗，对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杨述的批斗尤其严重。韦君宜回忆说：“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十七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 ◇ 哲学所文革的通宵会议

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北京郊区农村“滚泥巴”。毛泽东，也可能是康生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我们研究组（不叫“研究室”）的十多个人，就在北京郊区的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滚泥巴”。我们“滚泥巴”的具体做法是在徐辛庄公社里盖三间像大庆油田那样的“干打垒”房子。五月三十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全体“滚泥巴”的人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当天晚上，我们点亮了一千瓦的电灯，通宵达旦干活，油漆三间即将造好的房子的门窗。晚上油漆是看不清楚的，天亮后，我们发现，门窗上的油漆厚薄不均，十分难看。房子造好，没有住一天，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最早的文革，首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革”本单位当权派的“命”。哲学所所长是潘梓年，陈冷是副所长。这个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在哲学所参加了全所大会。会议从下午开到六月一日天亮。当时，哲学所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党支部书记陈冷。近二十小时的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冷如何不让大家贴大字报，这就被视为对抗文化大革命，为陈冷辩护的人，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叫姓邹的研究人员揭发党小组长于良华紧跟陈冷，劝说人不要贴大字报。于良华对邹说了一些劝说的话，于良华不承认。邹就拿出了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手放在桌子下面的记录，这使于良华哑口无言。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暗地里记录别人谈话、并作为证据，这使我非常震惊。整个晚上会议中，大家没有睡意，高潮迭起，到早晨，陈冷就被“斗”垮了，哲学所的全部权力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和吴传启手中。

我之所以记住近五十年前的具体时间，主要是那天早晨七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冷也同大家一起听广播。陈冷在来哲学所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从六月一日起，陈冷与支持他的几个人在一起，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楼走廊和厕所打扫卫生。

#### ◇ 吉祥剧院六四夺权大会

在《人民日报》上大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时，林聿时、吴传启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针对的是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写的《青春漫语》。批杨述后，学部大权仍然掌握在党委书记关山复手里。从六月一日林聿时、吴传启夺取了哲学所大权后，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全学部的大权。学部大院到处贴满了批判杨述的大字报。六月四日，学部在王府井吉祥剧院召开批判《青春漫语》大会，会议在几个人发言后，忽然有人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关山复、刘导生对杨述是“假批判、真包庇”，台下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的影响下，支持关山复的人被视为“保皇派”。六四大会后几天下来，关山复、杨述和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张友渔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剥夺了全部权力。

六月四日后，学部建立了文革小组，领导全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什么红卫兵，学部还没有明显地分裂为两派。在六月、七月，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起来按哲学所的模式造反，批斗当权派、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学部是聚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专家权威，除了个别人如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副所长金岳霖外，几乎都打成了牛鬼蛇神、黑帮。拿文学所来说，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研究室主任唐弢、朱寨、余冠英、蔡仪、贾芝、《文学遗产》的陈翔鹤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学所批斗大会上，何其芳、毛星的头上被套上了厕所里的字纸篓，在所里被批斗之后，这些人头上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的黑牌子，由所长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游街示众。钱钟书戴的是古钱币式的纸帽子。学部大院有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新建设》杂志社和学部机关等单位，到六月下旬，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有一百多人，他们多次站在一号楼后、戴着高帽子接受训话、批斗，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一张照片，照片上许多人还能认出。

#### ◇ 戚本禹李讷来到了学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有中联部的王瑞祺、时代。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林聿时、吴传启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当时学部有四个研究历史的研究所，一是在学部大院的历史所、二是在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三是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还有一个世界历史所。当学部许多研究所的领导垮台后，历史所却没有变化。六月中旬，历史所两个年轻人王恩宇、傅崇兰起来反对历史所负责党和行政的领导人酆家驹，这个酆家驹就是今天中国著名演员海青的舅舅。我曾经在一次食堂召开的历史所大会上发言表示支持王恩宇、傅崇兰。因为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恩宇、傅崇兰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我在哲学所既没有受到批评，也没有人赞扬，因为我无足轻重。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学部，与学部工作组组长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传达陈伯达指示。我到历史所礼堂参加历史所全体大会。我选择第一排边上

就坐，看到礼堂讲台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的巨幅画像。我在哲学所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像挂在一起，所以，我盯着林彪的像仔细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挑起的。对他歌颂毛泽东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格格不入。我想，要“造反”，就应当把林彪的像从讲台墙上摘下来，但我没有勇气。

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礼堂讲话传达陈伯达指示说，历史所领导酆家驹立即停职反省，王恩宇、傅崇兰获得释放，切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所副所长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自此，王恩宇、傅崇兰与林聿时、吴传启一样，成了学部公认的革命左派。王恩宇成了学部文革和联队领导人。我一点也没有为王恩宇、傅崇兰感到高兴，回到哲学所，我更加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可理解了。

#### ◇ 跨出反对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一步

七月十八日，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的结果，使林聿时、吴传启成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完全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大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当天，《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彭定炎写大字报起来反对林聿时、吴传启，我终于跨出了大胆的一步，我加入了彭定炎的行列，成为最早反对“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八个人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获得了行动的充分自由，我不再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和我所在的“研究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也没有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我们八个人除了彭定炎和我外，还有赵忠良、郭官义、付乐安、李甦、李敏生、张林珠。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小组”，作为哲学所的“少数派”，我们也有一间办公室。由于我们八个人，都没有当“头”的想法和能力，大家在一起，会开不起来，总是聊天，连学毛选一套都免除了。上班一会儿，有家的回家，我经常步行到东单、王府井闲逛。

反吴传启震动了整个学部。学部政治部文革小组的宿炳辰、毕求自，法学研究所文革小组的叶维钧、高崇福，带动他们单位起来“造反”，把目标指向吴传启。历史所王恩宇、傅崇兰此时已是学部文革“左派”，支持林聿时、吴传启。从此学部开始形成两大派。我们的“红旗战斗小组”也增加了几个人，其中有徐崇温、柳树滋、杨少春。

八月中旬，在学部大院临时建起来的“大席蓬”。八月二十六日，在“大席蓬”有几百人参加的一次辩论大会上，我上台讲话，被哲学所的张浩揪着头发拉下台，并轻微受伤。我们一派的人，立即把我送到同仁医院，医生还开了证明，这成了“八·二六事件”。当时，哲学所几个人写了一张揭露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贴满了一号楼后面平房的一面墙。最重要的错误言论是，“怎么能说打乒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输了怎么办？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

就在我被打的第二天，在林、吴的支持下，学部成立了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队长是邹永图。反吴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成立了“学部红卫兵总队”，队长是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戴念祖，文革中，他改名为戴念东。

#### ◇ 陶铸的四点指示

文革中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在学部大院的“大席蓬”内召开了七天辩论大会，“联队”、“总队”两大派一对一发言。哲学所的徐崇温一天中作了八小时发言，就像吴传启列举杨述“三反”言论一样，把吴传启文章中的言论一一列举，说吴传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大辩论造成了学部文革更大的分裂，两派如同仇敌。

在文革前，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在文革初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吴传启当然要小心翼翼地不涉及关锋。“总队”从吴传启的文章中摘录了几百句话，抓住吴传启曾经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之类的话，断言吴传启是“三反分子”。“联队”则坚持认为，吴传启与关锋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吴传启，实质上“老保翻天”，打击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的“左派”。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通过关锋，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九月二十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消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十二月十九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消息的吴传启、林聿时，指使“红卫兵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而我们一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不辨文革风向，凭感觉办事，为了与“红卫兵联队”唱反调，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十二月二十三日，后来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哲学所周景芳联名五十余人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学部其他研究所也贴出反对陶铸的大字报。在吴传启、林聿时策划下，学部红卫兵联队，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联合成立了“首都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

我们一派的人，远比“红卫兵联队”人少，大多数人是行政人员，不会写文章，写大字报也不容易。我学数学物理出身，当时也写不了文章。明明陶铸在九月二十日作出了保吴传启的四点指示，在我们一派贴了“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后，自认理亏，而“红卫兵联队”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因为四点指示中有一点是“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这表明，陶铸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 ◇ 伊林·涤西和联动的启示

我在大学时代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专业下有“专门组”，我进入的“专门组”是基本粒子物理学。我之所以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放弃数学物理，而报考哲学研究生，就是为了用科学来分析研究中国政治。我强烈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政治也不例外。看到文革中变动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并不关心学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出现的、无人管我是否上班的自由，几乎每天上街，从建国门步行到王府井、天安门、西单，到处搜集各种街头印刷品，包括传单、小报、油印资料。我在一份传单中看到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就跑到十一学校去参观。那次参观搜集到了当时全部联动资料，包括联动创作的许多讽刺江青的诗和顺口溜，以及揭露联动如何“反对中央文革”和打人情况的资料。联动在声明中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六〇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可以分为“六〇年前”和“六〇

年后”两部分。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003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两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起点。我自然科学出身，过去怎么会去注意什么“左倾右倾”和“专制制度”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见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大字报。伊林·涤西引用了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书中许多托洛茨基的话，说林彪的许多言论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这时开始知道，可以从历史现象来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单新华书店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买到。几天后，在科技大学时常去的公主坟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大学时代是不会去读斯大林著作的，也不关心什么苏联历史。在这时，我认真地把《论反对派》一书中托洛茨基许多“极左言论”摘抄在卡片上，锁在“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书桌中。当文学系的陈全荣、张大明记载有怀疑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日记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时，就在北京开始风传陶铸要倒台的第二天，哲学所文革小组派人就查抄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心急如焚，担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极左的语录”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罪证。因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影射林彪。在哲学所同事的帮助下，我到林聿时办公室大吵大闹，终于要回了我的书桌。在文革中，从此就不再记任何笔记。

随着陶铸垮台，我们一派一些人被看作是“反中央文革”，受到批判，“红旗战斗小组”和学部所有反吴传启的组织被勒令解散，“总队”土崩瓦解。

#### ◇ 从北京到广州的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离开自己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的现象。最早的串联是北京学校校际交往，后来，愈来愈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接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联，把北京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外地，不是学生的人也四处串联，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处游逛、看热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有五十万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大串联的文件，自发性的串联得到了正式肯定。学部不是学校，学部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学生。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通告，到这时学部还没有人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我们一派因被指控为“反对中央文革”而被摧垮。这时我想到独自一人到广州串联。当时，乘火车已不要票，但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站有学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们一派的人外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傍晚，没有人可以告别，我从建国门外宿舍沿铁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发现到车站附近就无法再沿铁路行走，有铁丝网和围墙隔开。在一处，围墙外地面垫得很高，许多人在翻越围墙，轻易就可以进入站内。我当机立断，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进入了火车站。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翻越围墙的行动，我也记住了这一天的日期。

在火车上，每节车厢超员二、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满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厕所只能从椅子靠背的木板上和人的肩膀上踩踏而过，上下火车只能穿越车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当我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好容易找到广东哲学研究所住了下来。因为没有床，只能睡在铺有草垫的水泥地上。

当我睡着时，有人叫醒了我。原来是我在北京哲学所同一研究组的同事陈一陞，他与我属于“敌对派系”。陈一陞正在广州筹建“首都批判陶铸委员会驻广东联络站”，因为是同事，他对我很客气，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审查，不能在广州停留。

我在广州只到越秀公园看了看，就在街道上东逛西逛，搜集传单、小报和各种印刷品，就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临到长沙，我突然决定下车。随便找到湖南省机械局大串联接待处住了下来。我没有地图，对长沙也没有概念，沿街步行，四处流浪。当我在公园里休息时，我拿出钱包数钱。回到湖南省机械局，发现钱包、工作证、粮票全都没有了。我向湖南省机械局接待处，讲明情况，借了钱和粮票，留下了借条，回到了北京。我的借条上留的是真实姓名。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就从邮局寄还了钱。

到北京当天晚上，我被人从建国门外宿舍叫到哲学所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坐着三、四十人，要我交代问题。在前排的是我原来同一派的几个同事，我记得有打字员杨少春，她对我做鬼脸。我就讲了如何翻越北京站的围墙、在广州遇见陈一陞、在长沙借钱的经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大笑不止。突然，司机季连亭拿了一瓶墨汁，用毛笔把我的脸全部涂黑。我一点也没有生气，不过停止了狂笑。当时我感到文化革命是一场幻觉，一切不可理解，我的目标就是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季连亭。我毫不计较的做法，使季连亭对我特别友好。多年前，听说他已去世，现在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也算是纪念。

我到过广州三次，第一次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大串联。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前后，到广州开会，参加了广州市长朱森林的欢迎宴会，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宴会厅的地毯比我见到的所有地毯都要厚，我在地毯上行走摇晃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第三次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经广州逃到香港。第一次大串联也是逃亡，时间不过十天，第三次的逃亡已历时二十七年，至今没有结束。

#### ◇ 学部文革三大派的形成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反吴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一次在东单邮局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召开的全学部批斗大会上，我们一派的头头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高崇福等十多人登台接受批斗，我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学部文革只有一派，就是林聿时、吴传启和红卫兵联队。学部联队参与了许多北京和全国性的文革活动，“批陶”、“反击二月逆流”，创办了《进军报》。林聿时、吴传启推荐《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周景芳到北京市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秘书长，联队十多个人在周景芳手下分掌北京市的许多部门，包括掌管《北京日报》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至四月，当时总队已经垮了，学部成了联队的一统天下，但傅崇兰开始另起炉灶，联合近代史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宜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成立了“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决心与林聿时、吴传启对着干。吴敬琏当年就是“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创建人之一和专案组组长。三十年后，“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这些创建人都成了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宗教等领域的专家或权威。

潘梓年是学部副主任、哲学所所长，他是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当时已年迈，没有参加运动，由于他受到林聿时、吴传启保护，大批部为了与林聿时、吴传启划清界限，就竭力打击他，学部大院里贴满了《揪出反共老手潘梓年》之类的大字报。潘梓年是《新华日报》创

建人，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文革学部三大派的斗争中，他在七十四岁的高龄，被送往江苏太湖的一个小岛上躲藏，结果被抓获，没有任何罪状就关进了监狱，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在狱中病逝。

在我被批斗后，没有人管我，联队的人也不要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我仍然在北京市内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向一位研究美学的、名叫郭拓的人不断借书看。郭拓有几百本内部发行的书，从这时开始，我才开始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开始读《世界通史》、《第三帝国兴亡》、《新阶级》、《赫鲁晓夫言论集》和几十本“灰皮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后，发生了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事件。毛泽东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被隔离审查。几天之内，学部形势大变，红卫兵总队复活了，在学部一号楼有了连通的大办公室。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至今没有出版过一部《学部文革史》。当年在学部的人现在都进入老年，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外国文学所工作，现年一百零五岁。我写学部文革简史，学部几派与北京天派地派的联系，没有写入。学部一些研究所发生的大事，如民族所洪涛的“一·一五”统战部档案事件，近代史所沈元事件，潘梓年的所谓“叛徒”问题，清查五·一六的一些个人专案，当时道听途说，现在许多都模糊不清了。这里就没有写入，相反，这部《简史》中加进了我本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严格地说，这一简史，只是在学部文革中从个人角度撰写的、不完整的历史，加上个人当时的感受，也许有助于减少叙述的沉重。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人写这一历史，取名《简史》，也许可以引发一些过去的同事，与我一样，奋笔疾书，共同拼凑出五十年前学部文革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一千七百人，除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逍遥派”外，分为三大派——联队、总队和“大批部”。除了这三大组织外，也有一些不被人重视的小组织，如李肇星的同学与好友、外国文学所郑土生，为了捍卫“红太阳”，成立了一个“卫三红”组织，当年我多次见到他拖着长长的大字报一人去张贴。他刚刚贴好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写上“畏三红”三个大字。郑土生充满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文革中他全心全意捍卫“红太阳”，说他“畏三红”，真是冤枉了他。

林聿时、吴传启是学部、也是全中国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学部三大派在对林聿时、吴传启和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的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不过，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种分歧没有多大意义，每一派都是毛泽东操纵下、有局部自主性的傀儡，毛泽东还利用这种自主性，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实行“群众专政”。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成了掌握无限权力的帝王，他的权力远超过秦始皇、朱元璋。

学部红卫兵中没有学生，除了个别年轻的工人外，其余的都是中青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岁。大多数人并没有参加什么红卫兵，但按当时派别倾向来分，往往说自己属于红卫兵联队、总队或“大批部”。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人，和一些不投入运动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像当年三十多岁的李泽厚，被人看不起，大多数时间属于逍遥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联队瓦解后，总队成了学部最大的组织，但戚本禹支持的大批部依然存在，许多联队成员加入了大批部。一九六八年二月，戚本禹倒台，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头头傅崇兰也被关了起来，大批部随之土崩瓦解。红卫兵总队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

陶铸的四点指示、陶铸的垮台、一九六七年九月关锋下台、一九六八年戚本禹下台，每一次大变化，都引起学部文革中一些人“站队”的变动。凡是紧跟“中央”走的人，总要不不停地“站队”。陶铸的四点指示一下达，一些人就从“反吴”变为“保吴”。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突然垮台。从“反吴”变为“保吴”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一些人今天站在这一派，明天站到另一派，后天发觉又错了。所以，学部文革初期流行一句话：“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

#### ◇ 文革历史资料的搜集

“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只是学部文革中少数人的感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没有站队问题，对文革不闻不问的逍遥派，也不存在站队问题。我在文革中虽然明确“站”了“队”，但并不怎样关心发生在身边的学部文革，我关心的是怎样理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刘长林告诉我，美国的一位记者约翰·里德，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当时把十月革命视为划时代事件。我至今也没有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当我知道一个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写一本书时，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种下了写一部有关文革这样大事件书的种子。

要写一部《文革史》谈何容易。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与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人就合写了一本记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书——《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终于在一九八六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发行了一百万册以上，出版了英文、日文版，书的主要作者并不是我，而是社科院医务室医生高皋，她在一九七九年开始利用每天下班后时间写这本书，我参与了修改和增补资料工作，书的部分原始资料是我在文革中搜集起来的。高皋在写《文革十年史》时，我则在写《首脑论》一书。

我特别注意搜集反对文革的资料。当时如果自己在笔记本中摘抄别人反对或攻击文革的话，如果被同事发现，就会有麻烦。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铅印的资料，其中附着反对或攻击文革的原文，一个人保存这些资料就没有任何危险。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开始，我搜集到《伊林·涤西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有关李洪山、易振亚、北京航空学院批中央文革、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大字报、发言和讲话油印稿、谭力夫讲稿、遇罗克的《出身论》、《四一四思潮必胜》、湖南“省无联”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等资料。我搜集了许多遇罗克资料，但在一九七八年秋天，被《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借去，说是给遇罗克妹妹看，当时没有复印机，这些资料从此就借而拒还，遗憾的是，有关遇罗克的情况就没有更多写进《文革十年史》。

学部和其他单位油印的首长讲话和大字报选编，我也搜集了很多。一九六六年十月后，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是小报、传单发行场所，北京许多单位在这里散发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有多种版本，只有少数很厚的《资料汇编》收几分至一毛钱。

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我在哲学所办公室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材料、书籍堆在书架上。徐懋庸是哲学所研究员，平时见他很少说话，当我在办公室中读到《徐懋庸右派言论汇集》时，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言论比所有文革中的所有黑帮还要厉害，我愈读愈觉

得他说得对。这使我感到，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还读到许多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言论集》、《托洛茨基言论集》和考茨基、卢森堡著作。这使过去只懂自然科学的我大开眼界，使我决心为弄清文革和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 ◇ 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后，随着王力、关锋垮台、红卫兵联队瓦解，红卫兵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分掌学部文革大权。总队与北京市许多学校和单位互相交换资料，从十一月份开始，我与外国文学所邵明瑞在学部创办了一份《长城报》，半个月到一个月出版一期，主要发表总队的资料和报道总队的消息，《长城报》这时也收到许多外单位的交换资料，这样，我就不需要到街头上搜集文革资料了。我的编辑方针是，《长城报》集中批判王力、关锋和林聿时、吴传启，办到第四期，我担心这样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极左”的政治倾向而成为“反革命”，为此离开了《长城报》。《长城报》由邵明瑞主编，而我直接与外单位一些交换站的人联系，以取得文革资料。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泽东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时，学部联队正在瓦解中，学部就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联队和后来的大批部的头头，差不多都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大小会的批斗。大批部成员孟祥才回忆说：“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关威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学部实际上没有五·一六组织，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胡耀邦翻了文革中的除了五·一六以外的所有“冤假错案”。现在，五·一六案仍然没有翻过来。

我对五·一六的了解比学部所有人的了解多得多。在一九六八年，在三里河国家经委大楼有一个文革资料交换站，我常去交换资料，认识了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一些朋友。因为学部多派之间争夺不息，学部和哲学所没有任何人管我做什么。有一段时期，我独自一人住在哪里，帮助交换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资料。我还常到北京站附近农口一个单位的资料交换站去。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几十份“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手抄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每一篇文章后面的署名“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中的“一”字都画成一个“火炬”。在学部和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我确信，除了张建旗那个有“火炬”的“五·一六”外，学部和全国的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后期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毛泽东在实现了他清除刘少奇势力后，对文革初期按毛泽东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册393—401页《清查所谓“五·一六”》，香港潮流出版社，1990年）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我在文革高潮中的自由就结束了。所有人都集中住在学部办公室，每天听军号起床，每天都要学毛泽东著作、早请示晚汇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五月初，我又想办法以取得摆脱开会的某种自由，我向军宣队提出编辑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战争与革命》语录，因为我属于学部总队，我的提议很快就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批准，在外国文学所大楼里，宣传队专门为我领导的“战争与

革命语录组”腾出了两间办公室，由我负责从各研究所挑人参加“战争与革命语录”的摘录和编辑，我挑选了五、六个人，其中有后来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历史所所长的林甘泉。我们办公室里有全套马恩列斯著作和毛选、世界史、战争史方面的多种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世界史，当时，我读到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在教堂门上贴的也是大字报时，我豁然开朗，觉得文革中的现象也是可以看清的。我把这一看法写进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们凭借《圣经》来反对教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凭借《语录》来攻击党政机构。”“宗教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拉向一个早已毁灭的时代。”我的世界史知识正是在这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

一九六九年夏天，正是学部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每天几次从我们语录组办公室到学部大院四处散步，除了休息时间外，学部大院的人都在学习毛选或批斗五·一六，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动。在每天上班后不久的、宁静的学部大院中，我听到的是楼房办公室里传出的语录声、慷慨激昂的发言声和军宣队的训话声，我独自一人慢慢散步，庆幸自己有不受束缚的时光，因为，在全学部范围内，也许只有我领导的小小语录编辑组内没有学毛选等形式，也没有任何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语录编好后，汝信、林甘泉等人就回原单位了。我找来了学部《新建设》杂志的郝明和外国文学所邵明瑞等人，一起做语录联系印刷和发行工作，我们这时就更自由自在，游离于学部激烈的清查运动外，直到一九七〇年夏天才下干校，才结束了这种自由自在的小环境。

#### ◇ 信阳明港五七干校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学部三大派独立活动的时代宣告结束，而大多数人仍然认同自己的派别。学部全体人员，除了金岳霖个别几个人外，所有老干部、老专家都集中在办公室里，睡在垫着草席的水泥地上。这时，研究室改编为连、排、班，每天听军号声而起身，集中出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吃忆苦思甜饭，进行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成了清查的对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按照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借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学部统统被赶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包括像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蔡仪、贺麟那样的老弱病残，随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述的就是学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这是杨绛《干校六记》中的话。杨绛说的干校，就是学部在河南息县和信阳明港的五七干校。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的一片低洼的荒地中，开始时，我们住在农民腾出的空房中，少则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住在一起，有的全家到干校的，一家住一户农民家。一个研究所的人分散在几个村庄中。晴天，我们步行七、八里路到地里劳动，下雨天，大家在床边学习毛选和开会。学部到干校的人很多，分散在息县大大小小许多村庄中，干校的总部设在东岳公社。

河南农村的茅屋土房和一望无际的原野充满了中原地区的田园风光，然而，一到下雨，沿着池塘边的泥泞小道，还不得不走到食堂吃饭。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梦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就是晴天，常常传出有一些老研究员傍晚从田间回家，漆黑一团，走错了路，跑到邻村去的事。文学所的红学家俞平伯全家到

干校，从北京带了许多箱煤球，到集市买虾、买高粱秆，也成为当时干校的话题。俞平伯在集市上买青虾时，询问农民多少钱一只。当地孩子知道俞平伯是反动学术权威后，就跑到他家门前大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则拿北京带来的糖果解围。俞平伯从集市买的有甜味的高粱秆插在家门口做篱笆，也被附近小孩毫不留情地一一拔光吃光。

在学部，许多闻名全国的专家，受到批斗，但在干校，多少还受到同事之间出于同情心的照顾，在菜园、厨房里工作就算比较轻松。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专家杨一之，受照顾让他养鸡，最后剩了一只，“杨一之”就成了“养一只”。而年轻人下地劳动，毫不轻松。不久，干校开始自己在一大片空地上盖房子。这样，所有年轻人就被分配做砖坯、烧石灰、做木工、瓦工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学部干校几百人就盖好了许多排平房，我们就从农民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房子中居住。

学部干校居住分散，需要从外单位调进几位医生。我妻子高皋在贵州毕节县清水铺医院当医生。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在一天从农田到住地的食堂来回走了四趟三十里路后，在傍晚又步行了十多里，来到设在东岳公社的干校总部，见到了军宣队的一位副政委李志民，向他要求调动我妻子来学部干校。当我从东岳公社回到村子时，已近深夜十二时了。而有幸的是，贵州省毕节县的一位领导人是文学所朱寨的哥哥。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努力。我妻子终于调到了学部干校。

一九七一年早春，房子盖好不久，学部干校由息县迁往明港解放军的营房。原因是，在这之前，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和《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在明港，不再劳动，而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解放军营房很大，每一栋连通的大房子可以住百余人。几乎天天开会，听解放军宣传队（军宣队）训话。不开会时，大家坐在床边的马扎上看书。规定要读毛选，但许多人在毛选下放一本其他书。李泽厚看康德著作，当时就被发现，幸而没有带来多大麻烦。我常常与一些老专家在营房外的马路上散步。温锡增是希腊哲学专家，他一次又一次与我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学部，大字报上揭发林聿时提倡“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一九六七年我编辑《长城报》时，请文学所刘士杰为这“三原则”写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长城报》第二期上。在明港干校，有一次，我与温锡增谈“政治斗争三原则”时，温锡增说，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有类似的说法。在当时正在清查五·一六的大环境中，我听温锡增讲话，感到万分惊讶。在这时，我还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不知道政治还有“学说史”，不知道政治学还是一门学科。在干校与温锡增谈话，是我后来决心研究政治学的开端。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得非常激烈，明港干校因清查运动就有几个人自杀，自杀后草草埋葬，第二天一早，尸体的衣服就被当地老乡剥下拿走。语言研究所有一人说“学部没有五·一六”，就受到猛烈批判。与我同一研究所的周景芳因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而被捕，他的妻子宣燕音也在哲学所。宣燕音独自一人在明港的池塘边想自杀被人发现。当我听到这样消息时，对政治的残酷感同身受。总的来说，在军宣队的压力下，学部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积极投入运动，许多人都是应付和消极的，对被整的人用各种细微的方式表示同情。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杨绛不是五·一六分子，但这话也适用于干校期间的运动。所以，杨绛说：“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在明港的清查运动进行了不到半年，因林彪九·一三事件而有所缓和。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老革命出身而研究美学的郭拓，对我说，中央出了很大的大事，不得了啊！他要我猜，我说，很大的大事只能是林彪出问题了。他并不感到我这么说有什么惊奇。郭拓的思想早就越出干校的清查运动，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范围。当听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毛泽东是秦始皇时，我已确信，中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帝国。这进一步增强了我放弃哲学，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四月，学部干校撤销，全体人员回到了北京。在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学部在息县建造的上百间房子，因为地势低洼，又无人居住，被周围的农民自发自动地全部拆光了。也许在一个被贫穷包围的大环境中，一个孤立的良好建筑和设施，如果没有新的动力支撑它，世界上总是存在一种“均一化”力量，使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七干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一九六六年时的毛泽东，头脑中经常还有种种改造人类社会的空想出现。他一个批示，就要求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去实现它。解放军总后勤部写了一篇《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后，大笔一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称作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了打仗外，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毛泽东要求工人、农民、学生都这样，不过，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了“文化革命”四个字，九天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接着，造反、夺权、红卫兵、红海洋、文斗、武斗遍及全国，毛泽东也不提自己的五七指示。各地各单位的两大派、三大派的斗争，使毛泽东觉得失去控制。为此，毛泽东用军管或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的办法来稳住局面。五七干校通常由军宣队带领机关干部到农村办的名为学校的农场。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系统所属的单位，就创办了一百六十所五七干校，把十四万名干部和小部分人的家属送到了农村。到五七干校在全国普遍推行的时候，毛泽东改造社会的空想就成了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残文化的“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场个人崇拜、强化皇权和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大灾难。

一九七二年春，全学部下放干校的人都回到了北京，这时已经搜集不到街头文革资料了，但有仍不断有复写的和油印资料在小范围流传，如一些手抄小说、批林批孔资料、李一哲大字报。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又有大量的文革资料出现。我经常在晚上八、九点钟，凭着长安街上的灯光，在王府井口和东单邮局一带抄写大字报和诗词。《告别》那首诗，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晚上九点钟、在天安门清场前半个小时在纪念碑上抄下来的，写入了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册第八一三页中。

当学部所有人都从明港回到北京后，军宣队仍然控制着学部。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各所还继续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回北京后，学部的活动都以各研究所为单位，没有文革初期那样的全学部事件了，在这一《简史》中，不再多谈，这里从简从略。这篇文章是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十周年的今天一天中，利用过去已写好的、分散的文字，加工而成的。写得太长了，读者也累了。

◇ 五十年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文革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年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泽东认定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林彪“九·一三”事件，为了弥补文革初期的过激做法，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重新让邓小平主政。毛泽东死后，华国锋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结束了十年文革。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因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掌握了最高权力。接着，否定文革，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

文革五十年后的中国，沿着邓小平的道路前进，中国已经成了不同于现代欧美国家的、受马克思谴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程度比今天欧美国家严重，而在政治制度上，依然没有民主法治，民众的权利不受保障。为争夺最高权力，依然与文革时代一样残酷无情。毛泽东“九大”确定的“皇位继承人”林彪，居然在“九大”两年后就逃离中国、死于非命。而毛泽东的遗孀被判重刑，自杀身亡。邓小平上台，废除了两位他亲定的“继承人”。毛泽东晚年的“天安门事件”使邓小平重新掌权，而面对同样性质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竟然采取了远比毛泽东晚年更残暴的镇压手段，动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抗议的学生和民众。胡锦涛登上皇位，大权旁落，江泽民像“太上皇”一样操纵朝廷。周永康、令计划的贪赃枉法超出和珅百倍。就是访民层出不穷，本身也是“王朝政治现象”，地方总管，也集中了行政司法大权，各霸一方。访民北京告状与层出不穷的街头抗议，不过是舒解民怨的两种不同方式。

学部文革从吴传启等贴大字报反对杨述开始。后来。杨述也到了学部在河南的干校，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后的六年中，杨述成了一个真正的访民。韦君宜说：“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就是这样的一个“忠于党”的杨述，到四人帮倒台后的一九七八年，那时，学部已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述已经得了脑血栓，社会科学院给他的结论是“维持原有结论。”

( 2 0 1 6 - 4 - 5 )

~~~~~

## 【谈史论今】

### 毛泽东之“梦”复活的氛围

• 丁学良 •

#### (一)

在2017年年尾至2018年年首的数月里，如果阁下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周游一圈，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私下交流，便会有一个沉重的话题不断被提及：眼下的大陆越来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气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笔者自从1993年夏时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内地以来，已经有过三次听到人们议论文革是否会再来的忧虑，比如1999年下令发动全国各地扫荡法轮功的高峰阶段，更记忆犹新的是薄熙来任职重庆搞得红红火火的那段时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么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

作此议论，而且举出好几条颇有份量的证据，却不能不令笔者严肃对待，不敢一笑置之。毕竟，这些人举例的内容是众人目睹的鲜活事件，不仅规模可观，同时蕴涵深厚。

#### ◇ 几大事例隔代呼应

北京市政府从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驱赶外地“低端人口”的举措，就非常类似于1968年发起的驱赶城镇居民下乡的运动。该年9月底，兼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的一位部队高官组织采访的报道里引用了会宁县老农王秀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的一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突出这句豪言壮语的报道随后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该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转登了这篇报道，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的“市”字，是毛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参阅《老年生活报》2006年11月27日张友琴短文）。于是，全国城镇马上把千百万无常规职业的居民，连同红卫兵一道，驱赶至乡下种田。时隔49年的两大清理运动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脚踢走，拒绝承受对“低端人口”的就业和福利负担——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万居民中有810万外来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但都是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运用强制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张淑伶：“回顾半世纪前中国人口大移动”，中央社驻上海特派员专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内地党组织和很多机关特别是学校，发通知告诫党政干部乃至严词命令学生群体不要欢庆圣诞节，“不参与宗教活动、抵制腐朽文化”。刚好时逢“毛诞”即毛泽东生日，于是乎是“崇洋”还是“崇毛”，是庆“圣诞”还是庆“毛诞”，上纲成政治态度和文化认同的选择。这又使内地知识界回想起文革中“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的红色风潮。

更敏感的比较，涉关“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变迁。毛从1960年代初开始，日益表现出对于“中央一线（刘少奇邓小平）和二线（毛）领导”安排的不满，最后演变成文革的翻盘斗争，一举废弃了高层权力相对分工的体制，全力锻造“一元化”的极端集权架构。用林彪最生动的语言表达，就是：“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要一元化。……我们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讲话》，无出版机构，第50—51页）。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反复批评这种体制，然后才有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来北京越来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日常的经济事务管理。内地知识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语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 ◇ 细考毛泽东之“梦”

因此之故，无论诸位的观点如何，都不能不正视内地知识界的沉重提问：“文革再来一次的气氛日浓，这意味着什么？”此一提问对香港同样含义沉重，因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间的香港大不一样了，与内地之间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笔者基于对文革的教学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几年），外加亲身经历的感受，从两组要素及其延续和演变来试图回应上述提问。

第一组要素是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愿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梦”——既关乎中国本身应该怎样，也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怎样。这组要素的延续和演变是把毛时代的梦对比于本时代的梦。明白了二者的深层异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来一次”问题的大半。众所周

知，毛这位超级革命家平生最后的梦和他排除万难大搞文革一脉相承，笔者整理了毛的文革梦内容，包含以下关键点。

第一点，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究竟是哪些？这个问题旨在让大家尽可能把毛的个人权力至上考虑、个性里的偏执狂和被谋害恐惧心理这类动机，与那些看起来更合理的动机作综合分析平衡的分析，诸如：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忧心重重，因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背叛革命”了；对中国社会里的商品经济元素和市场力量增生（即毛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译自 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点，毛文革中号召群众批斗党政干部、“吐故纳新”即大规模整党，显示出他对执政党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极度不满。毛的思路和做法，是否也受到了1949年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推行的改造老朽国民党做法的影响？这个问题旨在把现代中国最主要的两大政党的命运作比较，以深化对政治权力与政治衰败之间关系的透视。败退的国民党甚至提出了“毁党造党”的激进口号，终于体认到在大陆执政期间该党的自身素质越来越差丢了天下。假如撤到孤岛后不再大力整顿自己，很可能连台湾也掌控不住，那就是“死无退路”了（蒋介石语）。蒋领导层提出“毁党造党”的口号，目的是“永葆党国”，这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毁党救国”、“毁党建国”有本质区别（“胡适致雷震”，载万丽鹃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2001年版第115—116页）。但公平而论，若无1950年代发动的“毁党造党”运动，国民党继续像在大陆时那样松松垮垮、懒懒瘫瘫，它对台湾的统治绝不会那么稳固有效。终身密切关注国民党军政作为的毛，对此一定不会没有联想、毫无触动。

#### ◇ 和商业都市成反比的蓝图

第三点，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反复探索的意义丰富的社会科学和伦理学大课题，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家群体里面。中国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即简称的“五七指示”，里面毛对他所期望在中国建成的好社会有比较明白的表述（详见《人民日报》刊载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多篇评论和回忆录里，对毛的乡土版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有生动描述。笔者在明太祖的治军治国措施里，也看到诸多极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参阅聂作平：“安顺屯堡：在这里，发现明朝”，广州：《同舟共进》，2017年第9期第72—76页）。人们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为样板，其实毛对朱元璋的学习和继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画的社会蓝图经常被海内外华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国传统中的“五斗米道”、“大同书”、太平天国之类的农民社会主义愿景。正如R. A. Stein的历史性考察所显示的，自从汉朝以降，中国历代的“政治宗教运动，都曾试图依据‘太平’的原则，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实现往古的理想社会”（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95—796页）。毛的文革当然不例外，文革结束后内地知识界一再把毛的社会蓝图贬称为“小农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毛派理论家对此异常恼火。

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毛的好社会蓝图其实也有某些和犹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古老文化中的社团（香港称为“信徒团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类似的元素（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4页）。而对工作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商业都市的人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中世纪穆斯林军队征服巴尔干半岛以后，有意损毁那里的城市此前作为国际商业和文化



中心的发达自由多元功能，仅仅把城市变成统治集团官员的居住地和军事堡垒，由此导致那些原本繁荣的城市后来没有发挥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作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恰恰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作用，于是文艺复兴和近代资本主义就从意大利起步了（W. S. Vucovich:

“The Nature of Balk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Slavic Review*, December 1962, pp. 603—614; 阅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卷第8章）。这个情形和文革中毛下令的反都市化政策很有可比之处，更是与后文将重墨点评的香港和“文革再来一次”的疑问挂钩。

## （二）

整理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呈现出的他本人之“梦”的内容，需要关注的第四个问题是，毛的“五七指示”里有他的“未来社会愿景”，但并没有讲到新型政治权力的详细安排。有很多的文革经历者和毛主义分子一直声称，毛发动文革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实行巴黎公社一样的劳动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普遍民权，较为接近于香港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之一“长毛”梁国雄所提倡的那种彻底摆脱官僚统治的草根直接自治类型。最核心的证明毛确实具有“民权初衷”的文献，就是1966年8月8日毛亲自主持通过的中共中央指导文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规定：文革中的新型政治权力机关“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然而，当上海市于1967年“一月革命”中创建按照毛设想的新型权力机关“上海公社”的时刻，宣言草案中重复以上的规则，却被毛指令直接负责控制上海文革进程的张春桥统统删去，随后毛拍板允准改过的宣言里，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顿时烟消云散（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809—812页）。所以，普选制在当代中国，从来就是海市蜃楼。如果我们以毛亲自指导下成立的上海革命委员会作为他“梦”里的新型政权模式，那就不得不基本上接受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其意识形态主导是Mikhail A. Suslov 苏斯洛夫）为之选定的标签——“军事官僚专政”。

第五个问题，毛泽东究竟想选择谁作为他的接班人？这件大事在所有文革研究里，都是头等眩惑的疑问，因为毛搞文革的首要目的，便是废除集体领导制，把个人拍板制推向顶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把个人独裁体制中最高权力交替的超级难度和风险，放在比较政治社会学的宽广视野里考察。从斯大林和他挑选接班人的警示开始（即毛文革前和文革中反复告诫的“赫鲁晓夫教训”），继而把目光集中到毛和刘少奇、高岗的关系上——这些是文革的序曲——然后是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甚至延伸到江青和毛远新（Minnie Chan, “Shock Waves from Lin Biao Plane Crash Still Echo in Lead-up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Reshuffle”, *SCMP*, 12 September 2016）。因为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可轻视的解释：毛晚年的安排是为了一步一步步地、曲曲折折地铺垫到毛自己家的成员最终接自己的班。这在东亚是屡见不鲜的操作，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还是中间派的政权体系。蒋（介石）家、李（光耀）家、金（日成）家都成功地做到了，毛家为什么不能努力试着做？

第六个问题，文革是否开辟了一条在中国整治贪腐的有效途径？这个问题自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每年——至少直到两三年之前为止——都激起公众的浓烈兴趣，因为内地的贪污腐败与时俱进，表现形态和涉案金额都是日新月异。大家必须把文革之前和文革式的反贪腐做法，和20世纪中期以后其它方式的整治贪污腐败作对比，包括议会民主制度下、军事独裁制度下、政教合一制度下、传统君主制度下，殖民主义制度下，等等，看看各种方式的成本代价及其短时段和中长期的效果。凭借这个背景，我们才可能对当今中国内地的其它反贪腐方式，有冷静的观察和鉴别。

第七个问题，中共文献以前一直用“十年浩劫”来界定文革，时过境迁，站在目前的高度上回顾反思加展望，人们是不是认为文革在造成巨大灾难的过程中，也有其正面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有，是哪些？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和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的一位观念导师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反思出于同一个逻辑。也是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法国学生运动结束11年之后，马尔库塞大声对媒体说：“把1968年事件说成一场失败是愚蠢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法国事件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采访发表于刊物

《Match》，23 March 1979）。而笔者提出此一问题是基于很多研究者和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一再争辩：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有其主观的目标，但是一旦全民被发动起来以后，文革的进程就往往不是完全掌控在最高领袖的手里，于是有些元素就发挥了“钻空子”、“打着红旗反红旗”，或“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这类歪打正着的非预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经常被提及的政治领域里归功于文革的正面元素和后果包括：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大增，民众的自组织和自动员能力提升，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按照民主原则做事的经验提升；还有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这些更具争议性），比如上山下乡带来的偏远农村地区教育的改善，农民医疗得益于赤脚医生，乡镇开始发展初级加工业，等等。这些元素和人们当今焦虑的“文革再来一次？”内在密切相关。

第八个问题，能不能说“没有十年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得益于比较社会主义体制的观察研究。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有些外国学者就论说：邓小平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大彻大悟（今天看起来更显得是如此），决定性的来自于他们本人及家属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若无文革把中共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那些体制和政策折腾得乱七八糟，也许中国就和苏联一样，在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步步延续下来。可是十年文革这种翻天覆地的冲击，令那套传统体制没办法照常规支撑下去，改革开放于是就成为高层的明智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率先走出一条不同于它的姊妹国家的半资本主义道路、主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功不可没——物极必反。

第九个问题，缺乏强韧法治体系的政党或政权内部进行严酷的清洗——不论用什么术语去称谓，比如说“吐故纳新”、“党内斗争”、“争权夺利”、“窝里斗”等等，并不是中国的独家传统。仅仅就执政的共产党体制的范围里看，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红色高棉短短的几年在台上、朝鲜自从1940年代后期至今，皆有类似现象。但是，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的清洗，至今唯有在毛泽东统治的最后期。那么，这些中外党政军体系内部的“吐故纳新”的相同和相异是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以上诸问题的精髓。

以上的九个大问题都是浓缩过的，每一个都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子问题，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包括笔者本人也无法解答很多读者和文革课堂里学生们提出的相关探问。香港的大学生们十几年来，每年都抱怨上笔者的文革课程要读那么多的中外文书籍和数码资料库文件（即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发行的全套资料库），还有好多具体问题解答不了。首要的原因是至今有关中国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海内外众多中文报刊杂志在2008年11月底，兴奋地报道了“北京的文革档案将于今年底向公众开放”。大约一个月以后，在香港注册但可以在中国内地发行的《凤凰周刊》，宣告“中国大陆文革档案暂缓开放”。当时笔者在北京，研讨会上学者们感叹，“暂缓”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到了如今，更没有丝毫迹象会发生这样的公开档案的大好事。

香港虽然几十年里一直是全球有关文革的中文资料的出版发行重镇，然而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和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

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曾经发表过文革的回忆录。但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并不影响我们把以上整理的毛泽东之“梦”的大致内容，作为对照的一面镜子，再把当今的“中国梦”之官方版呈现的内容，作为另一面镜子，仔细看看这两面镜子之间，互相反光折射到了何种细微的程度。正如在本专栏上一篇评论里所说的，经过这样的对照，从两组要素（两面镜子）及其延续和演变，我们才可能理性地回应那个“文革是否再来一次？”的沉重提问。

### （三）

现在笔者把前两篇讨论的毛泽东之梦作一总结，可以把其中的诸多要素归纳成三大单元。第一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社会”，第二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三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三大单元的构成要素是我们展望未来的出发地。

#### ◇ 非同寻常的中国社会

先看第一大单元：此处的“中国社会”是广义的，包括经济和文化教育领域。在毛的设计图里，理想的中国社会是全民皆兵、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对毛泽东之梦的这个部分，林彪把握得最贴切，所以从1960年代初开始，林就反复宣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解放军，人人都要像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中共中央批示，1960年12月21日》。丁按：这是毛对该年10月20日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高度赞成和全面推广）。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的试验，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期已经着手，经济的崩溃使之半途而废。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该试验又被提上桌面，“五七干校”、“大寨样板”、“大庆样板”等都与之相关。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其物质基础当然是指令经济，所以它应该被视作“军事共产主义”体系的落实。中共执政后毛一直试图把国民经济推向这个轨道，考虑以配给制取代工资制，却因预算太高未能付诸实践（参阅毛亲笔点评和推荐的张春桥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文革中毛多次告诫：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让它无限期实施；商品经济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必须予以限制。指令经济下的中国当然无法和世界贸易体系连通，所以毛督促全国“自力更生”。至于文化教育领域，毛更不想中国交流外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修正主义的（苏联东欧），都必须彻底扫除其影响。

当今官方版的中国梦里，有多少上述“毛梦”的要素呢？让全国人民服从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显然是历届政府都愿意做到的。不论是以“维稳”的名义，还是以“平安中国”的名义，更遑论眼下国际上议论纷纷的“数码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的管控模式，都旨在把民众的言行约束到整齐划一的程度，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灵活性有些差别（Samantha Hoffman, “Managing the State: Social Credit, Surveillance, and the CCP’s Plan for China,” James Town. org, 17 August 2017）。在文化教育领域里阻隔外国的影响，当今的中国梦里只有一半的“毛梦”，即反对“普世价值”。教育上中国关不住大门，作为全球外派留学生总量第一大国的地位，延续已久，还会保持多年。实施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当今延伸下来的只有其中一块，即关系到强军的战略资源和保证政权永固的支柱产业。换言之，“国计”的一块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延伸，“民生”的不再是。

小结：“毛梦”里的中国社会设计，连接到当今中国梦里的要素，尚不及一半。即便未来十年形势更为严峻，也不会超过一半。我们只要把毛的“五七指示”等文本和毛的几次试验与当今中国社会两相对照，以上判断就能站得住脚。

#### ◇ 中国全面对抗世界

再看第二大单元：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自从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日益强化的一个信念，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避免地从莫斯科转向北京，毛是共产主义谱系的第三座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座，列宁斯大林是第二座）。1960—1970年代毛力主输出暴力革命，号召美国黑人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大本营，林彪把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上升为全球革命道路、即第三世界包围第一世界实现世界一片红（“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都是毛努力实现其颠覆世界梦的亮点。

尽管当今“中国威胁论”四处冒烟，但几乎没有严肃的观察家评论家认为北京正在输出暴力革命。中国目前和外部世界发生纠纷的，主要是源于这些：输出产品或产能、输出发展模式包括环境污染、输出资本、输出大外宣、输出治理模式。这几种输出也令很多老外担忧，但它们不同于暴力革命的输出，后者是要推翻“帝修反政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掀起多年的战火和流血；前者则主要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是你输我赢的竞争（“我们为何不应学习中国模式”，《新苏黎世报》2018年2月5日评论，DW中文网同日翻译转载）。未来十年或更长时段里，看不出中国会朝世界革命的道路迈进。中国当今的这些做法，一大半是从西方学来的，是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许多发达国家都做过，如德国和日本（Joshua Aizenman and Rajeswari Sengupta, “Global imbalances: Is Germany the new China? A sceptical view”, VoxEU.org, 5? October 2010）。最关键的是：当今中国的这些做法，是尽力在国际市场体系里多占好处，而不是摧毁它，像苏联阵营那样以社会主义贸易体系取而代之。目前中国最高层每天向世界大声呼喊的，是要推进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 ◇ 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度集权之后

最后看第三大单元：中国的政治体制。“毛梦”里面的几大单元，在毛生前就数这个单元落实得最给力，用林彪的话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批示》，1966年9月22日，发至县、团级学习文件，笔者学习后收藏）。毛毕生造就的这种政治体制，对后人影响巨深。哈佛大学商学院1990年代后期曾经在中国大陆对工商界中上层做过一个实证研究，发现他们最向往的领导体制即最想仿照的，就是毛模式，不论他们是否在毛时代挨过整受过苦，也不论他们是国企主管还是民营老板。有了这个普遍性的背景，我们对内地这几年日益强调权力集中再集中的趋势，就不该惊讶了。

综合来看，毛泽东之梦和当今中国梦的关联程度，以第二大单元最弱，第三大单元最强，第一大单元居中，这种整体格局对我们的未来意味深长。公众注意力显然一直是聚焦于第三大单元，恰如今年3月初北京“两会”前后的万千报道和评论所示。由于关注点一直偏重于此，无数人就担心中国不久“文革会再来一次！”笔者却不作这样的判断，理由简述如下：当今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无法借助“全民皆兵、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的毛式中国社会结构来实现，更不可能借助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两个阵营、你死我活斗争”的毛式全面对抗来完成。以“两个一百年”为时间框架的中国梦若非全盘落空，至少三种运行机制是必不可

少的——持续造富的国民经济，哪怕这个经济体里面充斥不公正和不平等，哪怕多位企业家个人的下场是个悲剧；持续注入中国经济的创新元素，不论是经由留学渠道或人才引进或专利购买或技术窃取；持续提供给中国巨量产能及产品对外输出的渠道，不论是通过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或是通过一带一路之类的国家资本主义大手笔操作。这三种运行机制可以在一个更自由的政治体系里更有效地起作用，也可以在一个更强制专权（Hard-authoritarian）的统治体系里以更高的成本起作用，但它们绝对不可以在一个原教旨主义环境和极端主义体制（文革期间便是这种综合状态）里挣扎生存。

◇ 有理由保持艰难和顽强的乐观主义

笔者坚信，当今的中国梦之落实，必须依赖企业家阶层、国际贸易商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尽管北京顶层不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行业资源和专业能力转换成对党国权力体制发出挑战的手段。香港未来之生存发展的空间与局限也与此一脉相承——这三个阶层是香港社会的支柱群体，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世代竞争形成的，难以被替代取消。他们活动的“天花板”早先（1997年之后的十多年）是玻璃做成的，而现在越来越换成是钢板材料的了，明摆在那儿，不许去碰撞。只要不去正面碰撞，就不至于摧毁你。

有些读者或许要问：为什么当今的中国梦不至于全方位对接毛泽东之梦？为什么第三大单元再趋强化，也不会演变成文革全盘回潮，决不会主动毁掉上述的三种运行机制及它们的三个操作阶层？这组问题已经超出了政治社会学的经验讨论范畴，进入到宗教学层面，比政治哲学更加形而上，只能留待以后再作诠释。

□ 原载：香港《信报月刊》，2018年1、2、3月号连载

~~~~~

【往事非烟】

## 父母家的抄家

• 庸 猫 •

过去，文革前的过去，不犯到谋反这样的大罪是不会抄家的。要是被抄了，随后不是发配就是砍头。在那红火的八月以后老朋友见面后往往第一句话不是“你好吗？”或“吃了吗？”，而是“抄了吗？”。那阵“抄了吗”代替了“你好吗”和“吃了吗？”。那样平静，那样顺口，好像抄家和问候吃饭一样平常。

我没有被抄过。不配！住学生宿舍，除被褥书本，也就一个只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我父母被抄过，不止一次。更确切一点说是不止一拨。我记得的头一拨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还有一拨是在1968年三四月我分配离家前。在第二拨时连我刚由学校运回家准备运走的行李也顺便了一次。至于后来的父母被扫地出门时是否又抄了一次就不清楚了。

抄家时我都不在家，没有目击。不是没有预感，从六月四清回校就预料父亲不会无事。不是没有时间，在那风声鹤唳和无人管束的时日，人不知鬼不觉蹬车用不了一小时就可到家。是不愿，不忍，也不敢。要是回去看到正在抄家或爸妈戴高帽子游街挨打自己又能怎么？还是狠狠心，眼不见心不烦吧！我想那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

记得回家时发现房间变大了，一套如今扔在街上也没有人捡的老旧沙发没啦。记得我父母的头还在也没有缠纱布，也还住在那里一只抄家没有动粗和发配。记得母亲平静地讲外婆

给她的一手绢包首饰和石头给“拿”走了。还说收拾残局时在暖气下发现一枚漏网的白金结婚戒指，当即给居委会送去，结果不收。于是这戒指回到母亲手指又过了三十多年。

何时抄的，我真不知道，谁来抄的也不知道。姐姐在家住，问她，她只记得抄过数目不详的N次，有一次还是半夜从屋顶上下来。天花板上也搜过，没找到珍宝。抄走的东西有收条，但值钱的首饰宝石的收据是“首饰一包”。首饰用“一包”来计大概古今外无人敢这样写，但大无畏的红卫兵这样写了。其实他们搜得真的不仔细。听说拆迁时那屋顶下的梁上还真有盖房时的镇房之宝——那房子在铁狮子胡同人民大学对过，雕梁画柱花砖地，很高大，不是寻常的家居四合院。听弟弟讲第一次抄家是我们的表弟“阿弟”的功劳。

易太太名李士珍，过去是有钱人的外室。认识时她是独身，在一个印刷厂的幼儿园当老师。有钱人留了一套三进四排的四合院。因平时她在幼儿园和在周末回来，她只在后院留下一面自住，其余的出租。我阿姨是她的房客和她同住后院。我家刚到北京时经阿姨介绍也成了易太太的房客，在前院中院间的正房住了四年。阿姨开始住北屋，在1958年房子充公前易太太换回北屋。易太太和房客关系极好，院子的孩子管她叫易妈妈。

六十年代初阿姨被“下放”到姨夫那个城市，家中只剩两个孩子。阿姨很放心，因为从小把表兄弟们带大的佣人德奶奶和房东易太太，还有在北京的姐姐。两个表弟都是好学校的好学生，65年大表弟上了清华，阿弟在高三。眼看阿弟就要考大学，不想文革开始了。两兄弟中老大忠厚老实，老二机灵。虽出身离红五类差得很远，阿弟凭他的机灵闹起革命了。干了什么大事，我不知道，但见他袖手旁观。

抄家前夕易太太大概听到风声，想着我爸是全国人民代表就把一包首饰送到我家让我妈保管。技校到易太太那儿没抄到东西后，阿弟大义灭亲，把他的大姨妈给卖了。我家第一次被抄就是这技校干的，我妈的一包首饰也一块给抄了。根据母亲说的“捡到戒指立即送到居委会”推测抄家时居委会的人也在场。戏剧的是居委会主任李莲英文革前在我家帮买菜做饭和打扫卫生。

网上说第一拨抄家是1966年六月到十月，可能在北京真正大规模抄家是八一八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里，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我家是被抄的那十一万分之一，但我父母不在那被赶的八万多之中。

按理在第一次抄家高潮之初不至于抄到我家，因为最早遭殃的是有“案底”的地富反坏右，我爸头顶有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罩着。另外和我家同住一个封闭小院的是正宗革命干部。更重要的是院里有正宗的老红卫兵。在天安门上挽着副统帅照相的广播学院红卫兵朱武成和魏金生响当当的战友白家三毛是我们小院的。三毛从来没和我家划清界限和他的爸妈还劝我父母千万挺住不要“想不开”。但我家被这技校抄了。可能三毛那时忙着抄别人的家忘了自家大院了。要是他们在家我想他们肯定会大喝一声“我们院的事轮不到你们”就把这帮技校的轰出去了。

知道家被抄了回学校是不能不说的。要对人说，不说是隐瞒。本来研究生就是没人管，那时又乱了套。对谁说？只好对几个同学好似随便的一声“我家给抄了”。只有同情的眼光，没有“要划清界线”的说教。真没想到过去要杀头流放的抄家这样的大事就随着一声“我家给抄了”就过去了。

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后面的抄家是必然，但第一次抄家是被牵连。易妈妈是房产主和以前有钱人的小老婆，这是“罪”。但易妈妈住西板桥我家在张自忠路，离着好几站呢！没有内奸再能干的侦探也不能由易妈妈家找到只是前房客的我。以后我父亲很不喜欢阿弟和阿弟见到我们脸上表情也总不很自然。至于他是否对我父母讲过一声“对不起”我就知道了。问了弟弟，他也不知道，但知道“爸根本不理阿弟。”。至于技校来抄家时阿弟是不是在旁边，姐姐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在”。也是，再坚定的革命者，除非像薄熙来那样的，要是真遇到亲人遭难时也很难有直视的勇气。

离开北京时我的行李要带走，但被封了。父母单位的造反派好说话，“拿走”。几个星期后因单位拒收而回校联系时我家已被扫出去一角一我和弟弟的房间没有了。父母单位1965年分来的大学生巴浩结婚住进来了。结婚要房子是正常的事，但解放快二十年为什么政府单位不解决，要我家给腾房子？我家也不是有多大的房子，连厨房储藏室也不过是号称五间的每间不足十平方的房子。半年多后春节探亲和弟弟一块回到北京，这时父母已完全扫地出门，轰到两小间黑屋子，没抄完的家具只好放在挡不了风雨的过道里。

五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为文革的灾难承担责任，只是一声“艰辛探索”。抄家时阿弟大义灭亲错了吗？真不好讲。那时他只是十八岁的少年，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干革命有错吗？只能说阿弟参加了“艰辛探索”。

2018年八月十一日。

□ 来源：《华夏快递》，2018年8月17日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